

# 女性、情感、私领域与慈善组织

——对慈济基金会南京会所运行的个案分析

仲 鑫<sup>1</sup>, 张爱华<sup>2</sup>

(1. 南京财经大学 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及访谈法,从女性、情感及私领域等方面,运用社会学视角研究慈济在南京的慈善公益活动,分析其在资金的募集与使用、组织结构、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的特点。研究发现,南京慈济在项目运行及组织结构上移植了台湾慈济本会模式,在运行中还体现出独特的女性视角、情感的运用,及“公领域”与“私领域”互为渗透的特点,这些特点使慈济能克服大陆许多民间组织缺乏组织性及纯粹科层制组织即事化、非人格化的局限性,并突破自身多重敏感性限制(源自台湾、宗教背景、民间慈善组织),在南京开展募心募款的慈善活动,这些都值得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借鉴。

**关键词:** 慈济基金会; 运行模式; 女性视角; 科层制; 私领域

**中图分类号:** C91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5)05-0046-08

DOI:10.14157/j.cnki.twrq.2015.05.007

## 一、问题意识: 女性、情感、私领域与本研究

慈善公益因其关注社会民生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公共领域的事务,其研究视角着眼于私人家庭之外的更大的社会人群。这种“为公”的价值理念使得对慈善公益的讨论无论是大陆学者市民社会或法团主义的视角,或者是海外学者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的转向,<sup>[1]</sup>都显示了一种公共领域宏大叙事的男性研究视角,公领域视角的研究描述了中国大陆慈善组织的发展轮廓,该领域的研究让公众了解认识了这些组织具有很大价值,但随着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目前更需要了解的是这些组织行动的细节脉络,需要对具体慈善组织运作的微观研究。因而,情感、女性等私领域的研究价值凸显了出来。本人认为,与体系中的理性科层制组织不同的是,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和情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情感在民间慈善组织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情感往往又涉及到性别及私领域的内容。

就性别而言,女性似乎一直是慈善组织中主要的志愿者来源,陈世慧提出“中国女性负责持家、照顾滋养家人的工作特质或社会期待”,<sup>[2]</sup>所以“与慈善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往往被人视为慈爱、慈祥、慈善的化身,人们在称呼她们时也多谓之慈亲、慈母、家慈等”。<sup>[3]</sup>研究发现,女性在公益领域里的参与率高于男性,如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捐赠,<sup>[4]</sup>已婚并育有子女且学历较高的女性有更高的志愿活动参与

**作者简介:** 仲 鑫,女,江苏南京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张爱华,女,河北保定人,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

率。<sup>[5]</sup>一些著名的慈善组织由女性倡导发起,如特蕾莎修女创办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本文的案例(由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基金会 Tzu Chi Foundation),和以著名女性领导命名的慈善组织如宋庆龄基金会等。

对慈善公益领域里的情感研究、女性研究较为突出的有卢蕙馨、黄倩玉、魏乐博、丁仁杰等。卢蕙馨研究了女性志工参与慈济对其性别角色、性别观念及性别形象的影响,认为慈济参与为女性提供了主动营求改造社会与家庭中的两性关系的渠道,让女性实现了性别跨越,重塑了女性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形象。<sup>[6]</sup>此外,卢蕙馨在“现代佛教徒入信的机制:忏悔的情感表述”中,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衡量情感在宗教生活中的影响力。

丁仁杰在20世纪90年代对台湾慈济的研究中就发现女性、情感及私领域对于慈济发展的意义。他提出,在慈济集体行动的框架中,采用了以家庭类比为基础的关系模式,“人们被视为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成员们经常用亲人式的关系来看待彼此”。“慈济和其他的佛教团体比较,慈济是一个特别在结构上把这些观念更强的实践出来的团体;也就是说,透过它的‘拟似’的家庭的连带,‘明显的集体范畴’,‘频繁的非正式的会议’,‘家庭式的小组工作型态’和‘像母亲一般的克里斯玛的核心领导者’,慈济的参与者之间于是可以很容易的滋生某种家庭关系式的‘情感连带’”。<sup>[7]</sup>

李玉珍的《寺院厨房里的姊妹情:战后台湾佛教妇女的性别意识与修行》,阐述了在寺院厨房的场域中,宗教女性透过煮食来建构其修行经验、凝聚团体共识和扩展社会关系网络,厨房里的分工,规范与再生产了其性别角色。

国外对于慈善公益中的女性及情感研究也很多,如摩尔(Moore)对于美国女性参与公益的研究发现,公益活动对于不同阶层的女性,意义是不同的,对于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志愿活动的功能主要是帮助女性调节自身来适应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它是女性家庭角色的补充,并不与家务活相冲突;而对于上层女性而言,志愿活动扮演了对于整个阶层都具有意义的角色,联结着她家庭和阶层的过去和未来,是她终身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她对自己作为上层阶层一份子的理解。<sup>[8]</sup>

本文想探讨的是,情感、性别等私领域的内容如何体现于公领域的慈善组织及其活动中,并发挥着意想不到的效果。本文聚焦于一个著名慈善组织——慈济基金会,并通过对这一点的讨论,展开对于慈善组织运行与发展及其社会意义的讨论。

## 二、作为个案的慈济基金会

慈济基金会(Tzu Chi Foundation)是著名佛教慈善公益组织,发源于台湾,事业遍及世界各地,在全球广有影响。至2010年底,它已累计援助72个国家和地区。<sup>[9]</sup>2008年1月14日慈济在国务院民政部正式登记,全名为“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正式开展在大陆的事业。将慈济作为个案,一是因为慈济是一个以女性为主要人力资源的非营利组织,男女性别比约为1:5;二是因为慈济的社会影响。讨论其个案,对思考大陆慈善组织的运行与发展有很大启发。

2009年,慈济开始在南京开展志愿者培训,此后,慈济在南京的慈善公益活动逐渐深入并日益丰富。慈济基金会南京会所(以下简称“南京慈济”)是慈济总会下面的一个会所。会所,并非指权贵出入的高级消费活动场所,而是慈济在南京的工作和活动地点,设在南京市中心一商贸大厦内,迄今已开展了环保、医疗、济贫、救灾、亲子教育等方面的多种慈善公益活动。目前南京本地志愿者(志愿者,指完成志工培训并请购灰色志工服者)大约200人。

2009年,笔者以新进志愿者身份进入南京慈济,在参加慈济四个月后就决定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并

向负责人说明,得到允许后,以志工兼研究者身份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围绕慈善活动中的女性及情感等问题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笔者参与慈济在南京的大小活动及部分外地活动,如新春茶会、志工培训、敬老院活动、环保活动、贫困生探访、济贫、岁末祝福等慈善公益活动,并去台湾慈济总部参访3次。笔者参与活动之后,通常会记录下当天的活动内容和感受,同时阅读慈济的文献研究并对慈济的主要出版物《静思语》及慈济歌曲进行一定的文本分析,同慈济委员、志工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一般访谈时间为3个小时左右,前后共访谈了18名本地志愿者。此外,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者将会进行二次访谈或电话访谈。

### 三、慈济组织运作中的情感及私领域特点

#### (一) 志愿者招募及资金募集方式:人情化与“募心”

南京本地志愿者基本上都是通过私人关系(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了解和进入慈济,有的通过南京的台湾慈济成员,有的通过本地慈济成员。慈济在南京早期的发展主要通过生活在南京的慈济台湾委员借助日常邻里交往、亲子教育等建立与本地人的接触联系,在交流中谈及慈济,进而相赠《静思语》,然后邀请对方参加慈济活动。访谈中一位志愿者是幼儿园教师,班上有学生家长是慈济委员(南京的台湾人),该委员在教师节赠以《静思语》,并邀请该教师参加慈济手语歌曲培训。教师参加慈济后,再邀请亲戚加入。这种通过私人渠道招募志愿者的方式正是借助了情感的运作,人与人之间借由熟人之间的了解而产生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进入慈济。运用情感私人联系的招募网络类似于慈济在台湾早期的发展。卢惠馨提出台湾的慈济在早期是“证严法师与其一群为数不多的女性信众之间的‘情谊’发展起来的”。<sup>[10]</sup>

南京慈济志愿者的招募体现了私人网络的情感效应,参与者进入慈济后,在原来的社会关系上增加了“法亲”(慈济中的家人都是“法亲”)关系,为世俗的社会关系赋予了一种涂尔干意义上的“神圣联接”的含义。慈济对于参与者的家人往往也会在活动中给予特别关怀,如活动由参与者自己家人以外的第三人进行邀请,<sup>[11]</sup>增加家人的“被重视感”、“价值感”,通过多种环节(心得分享等)对参加活动的家属表达感谢。

在资金筹集上,南京慈济延续了慈济早期在台湾的“竹筒岁月”传统。慈济发起人证严法师鼓励其俗家弟子(主要为家庭妇女)每日从买菜钱中省出五毛钱,存进竹筒做慈善,这种筹款方式被慈济总结为“竹筒岁月”。可以看出,“竹筒岁月”的筹款方式在早期是建立在证严法师与其俗家弟子的情感联系上,再由这种师徒间的情感扩展到其弟子的私人社会网络。在南京,情感联系在筹款上表现更为明显,许多慈济人是全家交功德款。本研究访谈的17位本地志愿者都向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劝募(交“功德款”,一般每人每月10-15元),其情感特色延续了“竹筒岁月”的传统。慈济在南京会所也备有许多“竹筒”(存钱罐),鼓励大众将其带回家,“日捐五毛钱”。

慈济在资金管理上还有一个特点“结缘”。慈济将救灾物资和给参与者的礼品称为“结缘品”,将善款用在正确的地方是与众“结善缘”。活动中,经常有“结缘”,笔者参与的许多活动都有结缘,如资深志愿者外地培训所需要用的早餐,冬令发放中受助乡亲的部分物资,岁末祝福活动中的小礼品,工作餐,读书会的午餐,敬老院活动中的部分小礼品,早期环保站的场地,一些活动经费等。“结缘”一词本就有关系联结、情感联结的含义,“结缘”一词的使用强化了善款的“善用”,为符号的货币和物品增加了情感的象征意义。

善款收据上个性化的《静思语》短句亦涵盖了情感(每笔捐款都有正式收据,每张收据上都印有不

同的《静思语》短句,如“脾气、嘴巴不好,心地再好,也不能算是好人”、“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等),收据不仅是捐款凭据,更是礼物,表达了对捐款人的尊重与祝福,在参与者中流动,赋予了善款“人情”的含义。

## (二) 慈善实践:公领域与私领域的互动与交融

据本研究观察,慈济的工作不仅有“公领域”的内容,也渗入到“私领域”,显示出“公领域”和“私领域”互相渗透的特点。其标志性慈善品牌如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慈济人称为“四大志业,八大脚印”)都落实在公领域。慈济的工作舞台不仅限于前台,也延伸到诸如行前动员、物资准备、场地布置、清扫、煮食、清场等后台的内容。举冬令发放为例,笔者2014年年初参加了苏北冬令发放,该活动既有传统公领域的探访贫困户、物资发放、人员及物资的动员筹措、与政府的沟通、新闻制作等工作,还包含如现场厨房煮食、行前手工环保礼品制作(晚安卡)、手语歌曲、物资筹备打包、人员培训分工、环境布置打扫、文字摄影、心得分享等许多后台的工作。特别是心得分享(在该次为期一天半的发放中,大的心得分享至少有两次,一次是活动结束后的现场,一次是回程的车上)。这种公私跨界、多样的工作内容为行善体验赋予生活化内容,一方面让慈善体验更为具体可见,另一方面降低参与者的门槛,“人人有事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慈善,为慈善活动带来了热闹、活泼的气象,为活动赋予了“情感”甚至“游戏”效应(正如一些资深慈济人挂在嘴边的,“做慈济就像玩一样”)。这种公私跨界的安排还起到了凝聚及加强参与者社会资本的效果,如活动前期,大家自动到会所帮忙打包发放物资,手工制作礼品,发放结束后,大家主动到会所,帮忙整理清点物资,边工作边话家常,既是工作,也加强了情感联系。

厨房本是家庭主妇的“私领域”,在南京慈济活动中则越界成为“公领域”,资深志工以厨房做教室,用自己的语默动静带动参与者,从如何煮食、餐桌礼仪,到慈济人文等一一教授给新的参与者,经常在厨房里看见资深的志愿者默默承担洗碗、扫地、拖地的工作。志工在厨房里一起煮饭,准备活动用的餐点,同时也在厨房交流,厨房经常是热闹的。在厨房的场域中,参与者(主要为女性)透过厨房工作建构其在慈济的体验,建立情感联系,扩展社会关系网络。访谈中,一些女性表示最先从厨房帮忙开始,然后对慈济的其他活动感兴趣,更深入地参与,从而成为资深志愿者。“第一次做饭是北京慈济打电话来为一个老人的老伴求助,能否给他一些心灵安慰,淑女师姐问我有无时间到会所做饭。煮大锅饭(好几个人一起做)。师姐夸奖我,认为自己很能干,能做一些事。所以自己在生活组和香积组。”(8号被访者访谈笔记)

话家常在慈济是一个经常的现象。慈济参与者女性居多,在工作时,一些师姐也会就自己的家务事进行讨论。志工的家庭烦恼、个人烦恼本属于“私领域”,但在心得分享中,经常可以看到志工当众诉说个人的家庭烦恼,忏悔以往的错误。当众诉说个人私事或忏悔似乎并不符合中国人爱面子和“家丑不可外扬”的社会心理,而在慈济,个人的烦恼痛苦通过正式的心得分享环节进入公共话题,成为“发露忏悔”(参与者在大众面前讲述自己的烦恼和痛苦),这种忏悔因将个体的痛苦当做人生众苦的示现,而具有启发更多的人认知苦、承担苦的公共含义。资深志工在现身说法中也多次提到自己如何化解个人烦恼和痛苦。个人的私事在慈济中因为能起到启发更多人走出烦恼而具有公共话语的意义。同样,许多家庭妇女走出自家私领域的厨房,走进慈济公领域的厨房,并借由家务工作的延伸,走进更广深的公共领域。

在慈济,食物是重要的资源,既是公益领域中的救灾物资与馈赠礼品,也用来表达私领域的情感。如冬令发放的现场,不仅有热食供应给等待发放的乡民,也为参与的志工煮工作餐;再如岁末祝福活动中向观众发放苹果、橘子等礼品,经由被赋予平安(苹果)、吉祥(橘子)的意义而成为具有一定神圣

含义的吉祥物。

“公领域”的工作和活动内容也影响着“私领域”，最明显的是志工参加慈济后的脾气、认知及行为方式上发生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通过参与慈善活动改变自己，从而改善与家人的关系。

“现在自己更加注意环保。心地比原来更宽，能容忍，更愿意受委屈。看《静思语》时，也会写下自己缺点，并进行对照。”（13号访谈笔记）

“那时就反省，但是慢慢往自己内心深处走的时候，发现自己许多问题，于是不停地去剥，剥到自己参加活动的真实动机，是否做善事真的是发自内心？对父母为什么没有做到这点？把自己最深的内心挖出来。回家之后，跟父母讲了慈济的环保和敬老院的感想。当时，正好家里吃烤山芋，本来是把一个软的山芋习惯的拿给自己，但是想到了慈济，就那么一秒钟，就把它给妈妈，妈妈说‘到底去过慈济，不一样了’。”（1号访谈笔记）

“本来一般不参加外面的活动，原来不觉得自己幸福，进入慈济后，觉得自己应该感到很幸福。在感恩方面有所提高。如师姐说，‘我应该感恩他们，是他们让我有付出的机会’。”（10号访谈笔记）

后继访谈的一位台湾师姐表示，“参加慈济后，学会了泡茶，以前就随便把茶叶放在茶杯里，现在学会了用茶壶泡茶、品茶，还学会在家里进行垃圾分类。”（18号访谈笔记）

公领域的内容影响私领域，用慈济的话说是“法入心”、“法入行”、“修行”，慈济一些女性志工参加慈济之前与丈夫关系出现问题，进入慈济后，反省自己原先的行为，开始改变，家人目睹该志工改变后感到好奇并感动，也参加慈济，从而促进了家庭的和谐关系。

### （三）组织与管理：科层制中的情感

南京慈济组织上体现了科层制结构的外观，不同于韦伯对科层制描述的过于理性的特点，慈济在科层制的组织外观中糅合了柔性情感。慈济内部的组织架构是其创始人证严法师于2003年提出的“立体琉璃同心圆”四合一架构，<sup>[12]</sup>围绕着“立体琉璃同心圆，菩提林立同根生，队组合心耕福田，慧根深植菩萨道”这个精神内涵，慈济基金会将资深志愿者分成四个队组：合心、和气、互爱、协力。合心组是资深的慈济委员，是慈济的核心层，负责传承慈济思想理念；和气组负责布置任务；互爱组负责项目规划进度及协调人力；协力组则负责执行任务。慈济组织被比喻成一棵树，合心组是树根，和气组是树干，互爱组是树枝，协力组织是树叶。<sup>[13]</sup>这四个组“人人平等，没有上下，前后，高低之分”。<sup>[14]</sup>

南京慈济由于规模尚小，目前只有互爱组和协力组，由于活动需要，互爱组各个分布在协力组。南京慈济的协力组按志愿者各自居住区域分为四个小组，各个组设有组长和副组长。

从慈济对组织各个部分的命名及比喻的运用，如“同心圆”、“树”、“树根”、“树干”、“树枝”、“树叶”及“合心”、“和气”、“互爱”、“协力”等词语的运用，可以看出其所赋予的拟家庭情感意义，体现了将事业体视为家庭体的女性视角，正如证严法师在各种演讲中经常将慈济的事业喻为“如来家业”，“以爱为制度，以戒做管理”一样，“立体琉璃同心圆”所展示的不仅是条理分明、分工明确的现代组织形式，而且这形式被赋予了浓厚的期望与情感成分，体现了女性的视角，是现代科层制组织结构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情感在南京体现在“工作（慈济人称为如来家业）传承”上。访谈中，慈济南京第一位委员（台湾人）、目前是南京慈济总互爱（总负责人）表示，在慈济中要考虑如何让每个参与者做得欢喜，因为大家都是拿工资的志愿者，不好用命令的口吻，而要多用情感联系，特别是慈济中的干部，要用爱的方式让大家做慈济，即使发现有的人不是很适合某个工作，也要用尊重和关怀的方式，善意地提醒，不能用批评的方式，批评了人家就不来了（根据访谈后的回忆整理）。用情感打动人的方法在慈济被称为“法亲关怀”。

慈济的层级管理与韦伯所描述的科层制职权等级不同。首先，在慈济，职权等级是承担责任与付

出的等级。资深慈济人用自身的行动、情感的投入,陪伴感动新的志愿者,被称为“传承”,“用爱做管理”,而非下达命令的方式。居于权威上层的资深志工往往承担看似琐碎、平凡、幕后、繁重的工作,而将可见的、表演性的、有成就感的工作交给新进志工。其次,慈济的“立体琉璃同心圆”也不同于韦伯所描述的固化的科层制结构,而是流动的,“没有先后,不分上下”。如每次活动,志愿者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轮流做总召(活动的负责人),对该活动的主要决策具有发言权。再次,慈济也颠覆了科层制对于工作内容的等级制印象。在很多活动中,越资深的委员,做越不显眼的工作,如大陆的第一个慈济人(邱师姐),在一次环保活动中就主动承担打扫卫生的工作(笔者回台参加慈济心得分享,有志愿者表示对该师姐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卫生间看见她打扫,当时不知道她在慈济的身份),南京慈济的许多资深志愿者都承担过打扫卫生的工作。又如,南京慈济一位志愿者表示,刚来会所的第二天就看见 XL 师姐(该师姐是台湾企业家)在卫生间打扫卫生;还有志愿者分享自己 2013 年年底参加慈济在苏州的人文教育交流活动,看到资深的 YSX 师姐在卫生间打扫,亲手整理垃圾桶,让她极为感动、佩服;访谈中,一位南京慈济人描述她去四川参加赈灾(5·12 地震)的经历,当时她被派打扫厕所,一位资深委员过来称赞她是最优秀志工,因为在慈济只有最优秀的志工才可以做打扫厕所的工作。因此,与韦伯所论述的科层制职权等级与法理型权威相联系不同,慈济的职权等级往往和人格魅力权威相联系:参与者对资深委员的服从来自于对组织的认同、证严法师及资深委员自身的人格魅力,而非外在的规范及奖惩制度。正因为情感的投入,慈济组织也具有了拟家庭化的特征,正如证严法师是全球慈济人的“大家长”一样,南京慈济总召(负责人)也被视为南京慈济人的大家长,大家都亲切地在其名字后加一个“妈”来称呼她。

#### 四、结论与启发

慈济发源于台湾,是具有佛教背景的民间慈善组织,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敏感特点的组织如何适应大陆环境,并在具有“差序格局”的社会心理环境中开展“募心募款”的慈善公益活动?本文通过对慈济南京会所运行模式的观察,总结出一些特点。

##### (一) 女性视角的运用

慈济是专业的慈善组织,也是女性为主体的组织,慈济的大部分参与者是女性,本地精英志愿者(慈济授证委员)的性别比为 1:12。女性参与者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还将自己的家人、朋友带入慈济。慈济的许多活动,也考虑到女性的安排与需求,女性的特长在活动中得到很大发挥,表演、手工、厨艺、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环境布置都是富有特色的慈济工作。慈济每个活动之后都有心得分享,该环节满足了女性倾诉的需求。

慈济的资金募集策略体现了女性特点,日常生活中的零碎事物,如零用钱、“米”、“扑满”(存钱罐)等成为慈善捐款的主角。“粒米成箩,滴水成河”,“小钱行大善”,“竹筒回娘家”,这些日常生活中具女性特点的、不起眼的零碎物品,借由持续的积累和韧性,积少成多,使慈济在南京从无到有,短短几年时间,发展了 108 位见习以上的本地志愿者(慈济志愿者按照参与的程度有委员、培训、见习之分)。女性特点还充分体现在活动细节中,如慈善活动现场干净的厕所,参与者的温馨手工小礼品,肢体上的拥抱,语言上的“感恩”,分享中的泪水等。

慈济的案例显示了女性的力量,慈济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内容及特点对于当今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有特别的启发价值。女性一直是慈善组织主要的志愿者来源,女性通过参与慈善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从囿于自己小家庭的茶米油盐到学会关注公共事物,在对公共事物的参与中,

女性发现自己的力量,“女人当男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性别跨界,重塑了女性形象。契合女性特点的工作内容,如茶道、花艺、手语歌曲等,也让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产生共鸣。因此,慈善组织或许要借鉴性别视角,重新认识和发现女性的力量,让女性在该领域中充分发挥其美、善的特质,帮助女性提升自信和价值,通过慈善参与提升女性社会参与平台,扩展女性视野和精神高度,帮助女性将其对家庭的有差等的爱扩展到更广泛的公共生活领域。

## (二) 科层制中情感的运用

慈济所采用的科层制组织架构(四合一)使它避免了一般非营利慈善组织的松散、不确定、缺乏规划、制度缺失、无法监督、志愿者和支持无法持续的弊端;另一方面,组织运作的具体细节中又充满情感,如慈济资金使用上的“结缘”、“募款募心”,拟家庭化“师兄”“师姐”“师姑”“师伯”的称呼,对慈济内部家人的“法亲关怀”(为家人庆生,对生病家人的关怀、生活上的帮忙),活动中经常见到的感动流泪场景等,印证了丁仁杰、卢蕙馨等对台湾慈济的研究。证严法师所提出的“以爱做管理,以戒做制度”的“爱”与“戒”相结合的管理策略正是将情感蕴含于理性的制度之中。

慈济组织中情感特点的运用对于当前慈善公益组织的运作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注重情感和培育爱。慈善组织从其起源上看,与人类的高级情感密切相关:怜悯他人的苦,不忍他人的痛(在慈济表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在慈善活动中,这种情感通常指向受助的弱势群体,忽略了慈善工作者自身,专业的慈善工作者——社工——常有被“耗尽”(burned out)的感叹。慈济案例显示,对于参与慈善工作的人,更要有情感的投入,只有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感受到情感的力量,助人的快乐,他们才能把这种爱和快乐的力量传递给受助者。慈济“以爱做管理”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管理:通过爱的投入,获得志愿者情感上的认同与行动上的服从。情感投入、唤醒或激发或许是慈善公益组织的使命之一。慈善组织的使命不能停留于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上,而是要通过慈善工作让人们(包括志愿者)感受到高级情感,并激发其自身爱的力量,让参与者获得愉悦、安慰、满足等积极情感,通过这些积极情感激发深层次爱与同情,慈善组织自身则完成从服务输送到爱的培育组织的转型。

## (三) “公”域与“私”域的交融

慈济不仅在社会服务的“公领域”运作,其影响也渗透到“私领域”,形成“公领域”与“私领域”的跨界与交融。如行善实践方面,私领域的家务劳作,现场煮食、茶点、花艺、游戏进入公共领域;私人交往圈成为志愿者招募及资金的主要来源;个人体验甚至烦恼、倾诉进入公领域的心得分享;家庭成员被赋予“法亲”含义;工作场所中,厨房、卫生间、活动交通车等从后台变为前台;资金使用上的“结缘”等等。同时,“公领域”也对“私领域”渗透,通过慈济活动而结成的姐妹情谊、志愿者的改变、家庭关系的改善等,以及通过这些改变改善,带动该个体更深入地参与慈善并通过参与者的心得分享,感染和带动更多的参与者,从而为慈善组织带来更多的志愿者和捐款。这些被慈济称为“法入心,法入行”的生活实践消解了慈善领域中公私的界限,改变了公领域工作及关系的即事主义、呆板、仪式主义、缺乏人情的弊端。善行与教化的能量在“公领域”、“私领域”流动,让两个场域互相促进、沟通,为公领域的工作增添亲和力,让其更精致、注重细节,让慈善公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赋予慈善活动生命教育的意涵。

慈济活动中公领域与私领域的渗透、交融与情感的运作机制一样,使得慈济活动富有“人情味”、生活化,凝聚了志工,扩展了慈济活动真正受益的人群,拓展了慈济慈善公益活动的广度与深度。

这一点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慈善工作就其性质本身而言,是可以跨越公私领域的。长期以来,公领域的活动给人一种仪式主义,或韦伯所说的“即事主义”感觉。人们在其中的行动是为了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完成外在的任务。因其事本主义的特点而缺少了许多真性情,个体经验被淹没

在科层制的仪式主义中。公领域颇类于戈夫曼所说的“前台”，大家按照统一的剧本进行表演，掩饰自己的内心情感；私领域更像是“后台”，人们放下面具，在一定程度上平等地交流，因生活化而亲切。在这个意义上，私领域生活化、柔性的力量、所流露出的真性情将是对公领域缺乏情感及过度仪式化的有力补充。

本文通过慈济南京会所运作的案例分析，展示了其中女性、情感及私领域的特点，以期对中国大陆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和研究有一定借鉴和启发。

#### 注释：

- [ 1 ] 张紧跟《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 NGO 研究述评》，《社会》2012 年第 3 期，第 198 页。
- [ 2 ] [10] 转引自陈世慧《现代宗教的认同形式——以慈济基金会为例》，东吴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2005 年 7 月，第 90 页。
- [ 3 ] 靳环宇《慈善事业与近代女性角色意识的彰显》，《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第 101 页。
- [ 4 ] Andreoni J., Brown E. & Rischall I. “Charitable Giving by Married Couples: Who Decides, and Why Does It Matter?”,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8( 1) 2003 pp.111-133.
- [ 5 ] Penny Edgell Becker, Pawan H. Dhingra. “Religious Involvement and Volunteering: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Sociology of Religion*, 2001 62 p.324.
- [ 6 ] 卢蕙馨《性别、家庭与佛教——以慈济功德会为例》，《性别、神格与台湾宗教论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 年；卢蕙馨《现代佛教女性的身体语言与性别重建：以慈济功德会为例》，李玉珍、林美玫合编《妇女与宗教：跨领域的视野》，台北：里仁书局，2003 年。
- [ 7 ] 丁仁杰《社会脉络中的助人行为：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个案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99 年，第 216 页。
- [ 8 ] Joan W. Moore “Pattern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6, No.6( May, 1961) p.594 p.598.
- [ 9 ] 《慈济年鉴 2010》财团法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2011 年 4 月，第 566 页。
- [11] 在慈济一次会议中，资深慈济人就叮嘱大家，邀请慈济志愿者的家人参加慈济工作或活动最好是要该家人以外的慈济人邀请，以示尊重。
- [12] [13] [14] 潘煌《证严法师立体同心圆》，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第 432 页，第 429 页，第 427 页。

( 责任编辑：张文生)

## Female , Emotion , Private Sphere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Operation of Tzu Chi Foundation Nanjing Club

Zhong Xing , Zhang Aihu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Tzu Chi Foundation in Nanjing’s charity activities in the fields of women , emotion and private sp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by using a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 it also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apital raise and use ,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Nanjin Tzu Chi has transplanted the model of Taiwan Tzu Chi in project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ich reflects in its operati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inine visual angle , the use of emotion and the mutual infiltration between “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sphere”. These characteristics help Tzu Chi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ainlan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lack of the sense of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and the pure bureaucracy , and furthermore ,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multiple sensitivity themselves ( originating from Taiwan , religious background and privat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 , thus enabling them to carry out fundraising charity activities in Nanjing , which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mainl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Tzu Chi Foundation , operation mode , female perspective , bureaucracy , private sphere